《易經》研究：康熙和法國傳教士白晉的文化對話

張西平*

清代入華傳教士白晉長期生活在康熙皇帝身邊，深得康熙皇帝的愛寵。為使白晉瞭解中國文化，康熙曾專門安排人幫助白晉學習《易經》。而身處“禮儀之爭”時際的白晉，在傳教政策上面臨考驗亦亟需重新思考。他通過對《易經》的研究，在來華傳教士中確立了一個新的派別——“索隱派”。然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白晉的《易經》研究尚停留在表面化的一般紹介上。本文依據藏於羅馬梵蒂岡的原始文獻，首次根據白晉的手稿對此段歷史作深入一步的研究，旨在分析白晉手稿的特點及其在研習《易經》的過程中同康熙皇帝進行的思想與文化的對話。

晚明耶穌會士的入華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件大事。特別是在清朝初期，這中西文化的交流達到很高的程度。由於迄今大部分西語文獻和檔案尚未公佈，研究的進展並不很理想。康熙時期，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法國入華傳教士白晉等人對中國經典《易經》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研究，這是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部分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1) 然而由於白晉研究《易經》的中文原始文獻尚未公佈，絕大多數學者在研究中還無法使用這批中文文獻，從而使這一問題的研究仍然處於若明若暗之中，許多問題未能解決。本文依據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白晉讀易的原始文獻，並吸取近年來國內外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對通過《易經》研究在康熙和白晉之間所展開的文化對話試做一次系統的分析研究。

康熙安排白晉等人研究《易經》的基本歷史情況

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為首批來華的法國傳教士，到北京後和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一起在宮中為康熙服務，深得康熙寵愛。白晉很早就開始研究中國文化。1697年他返回法國，在巴黎講演時就說：“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易經》這本書蘊涵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者和中國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2) 這說明當時白晉已經研讀了《易經》，已瞭解《易經》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六年後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白晉已經寫出了自己研究中國典籍的著作《天學本義》(3)。在《天學本義》自序中，他提到《易經》說：“秦始皇焚書，大易失傳，天學盡失。”其書之目的在於恢復天學。這本書的上卷是“擇其小經文論上天奧妙之大要”，其下卷是“擇集士民論上天公俗之語”(4)，如韓琮在給白晉《天學本義》所寫的序所說的“此書薈萃經傳，下及方言俗語，其旨一本於敬天”(5)。此時，白晉研究的內容已經涉及《易經》，但尚未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易經》的研究上。

目前所發現的康熙開始專門安排白晉讀易的最早文獻是——

四月初九日，李玉傳旨與張常住：據白晉奏說，江西有一個西洋人，曾讀過中國的書，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可以幫得我。爾傳於眾西洋人，着帶信去將此人叫（到）。再：白晉畫圖用漢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幫着他略理，遂得幾張連圖，着和素報上帶去。如白晉或要欽天監的人，或要那裡的人，着王道化傳給。欽此。(6)

據學者考證，這份文獻的時間應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7) 傅聖澤進京後在和白晉一起研究《易經》的過程中，康熙對他的研究情況也十分關心：

> 臣傅聖澤在江西聆聽聖旨，命臣進京相助臣白晉同草《易經》稿。臣自愧淺陋，感激無盡。因前病甚弱，不能陸路起程，撫院欽旨即備船隻，諸凡供應，如陸路速行於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趨赴行宮，恭請皇上萬安，奈受暑氣，不能如願，惟仰賴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軀復舊，同臣白晉竭盡微力草《易經》稿數篇，候聖駕回京恭呈御覽。(8)

在白晉研究《易經》的過程中，康熙一直十分關心他的研究情況，多次問到此事。

> 初六日，奉旨問：“白晉所譯《易經》如何了？欽此。”王道化回奏：“今現在解算法統宗之九攢九圖聚六圖等因具奏。”上御：“這幾個月不曾講《易經》，無有閑着，因查《律呂根原》，今將黃鍾等陰陽十二律之尺寸積數、整音半音、三分損益之理，即如簫笛、琵琶、弦子等類，雖是頑戲之小樂器，即損益之理也。查其根源，亦無不本於黃鍾所出。白晉釋《易經》，必將諸書俱看方可以考驗，若以為不同道則不看，自己出意敷衍，恐正書不能完。即如邵康節乃深明易理者，其所占驗，乃門人所記，非康節本旨，若不即其數之精微以考查，則無所倚，何以為憑據？爾可對白晉說：必將古書細心較閱，不可因其不同道則不看。所譯之書，何時能玩？必當玩了才是。欽此。”(9)

這是康熙對白晉研究《易經》的具體指導，告誡他應如何讀書。《易經》為六經之首，作為一個外國傳教士，要想讀懂並非易事。白晉在回給康熙的奏書中也道出其苦衷——

> 初六日，奉旨問白晉：“爾所學《易經》如何了？欽此。”臣蒙旨問及，但臣係外國愚儒，不通中國文義。凡中國文章，理微深奧，難以洞澈，況《易經》又係中國書內更為深奧者，臣等來中國，因不通中國言語，學習漢字文義，欲知中國言語之意。今蒙皇上問及所學《易經》如何了，臣等愚昧無知，倘聖恩不棄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晉同傅聖澤細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覽，求聖恩教導，謹此奏聞。(10)

由此可見，康熙對白晉等人研究《易經》活動是抓得很緊的，傳教士們幾乎跟不上康熙的要求和期望。

傅聖澤進京後原本和白晉一起研究《易經》，但後來兩人在認識上有了分歧(11)，梵蒂岡的一份文獻說明了這一點——

> 有旨問，臣白晉你的《易經》如何？臣叩首謹奏：臣先所備《易稿》粗疏淺陋，冒瀆皇上御覽，蒙聖心宏仁寬容，臣感激無極。臣固日久專於《易經》之數管見，若得其頭緒盡列之於數圖。若止臣一人愚見，如此未敢輕信。傅聖澤雖與臣所見同，然非我。皇上天縱聰明，唯一實握大易正學之權，親加考證。臣所得易數之頭緒不敢當，以為皇上若不棄鄙陋，教訓引導，寬假日期，則臣二人同專心預備，敬呈御覽。(12)

這是白晉告訴康熙他與傅聖澤兩人在研究上的分岐，希望康熙來定奪。這也說明了康熙對白晉等人的《易經》管的還是很細的。

傅聖澤於康熙五十年（1711）進京協助白晉研究《易經》，他和白晉有了分歧後，康熙就安排他做數學和天文的研究。他在康熙五十二年四月（1713）給康熙的奏書說：

臣傅聖澤係愚儒，不通中國文義，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曆法之根，去歲帶至熱河，躬親教導，實開茅塞。《日躔》已完，今歲若再隨駕，必大獲益，奈自去口外之後，病體愈弱，前病復發，其頭暈頭痛，迷若不知，即無精力去。去歲猶有止時，今春更甚，幾無寧息，不可以見風日。若再去口外，恐病體難堪，仰[13]且誤事。惟仰賴我皇上洪恩，留臣在京，靜養病軀。臣嘗試過，在京病發之時少而且輕，離京則病發之時多而且重，今求在京，望漸得癒，再盡微力，即速作曆法之書，可以速完。草成《月離》，候駕回京，恭呈御覽，再求皇上教導。謹此奏聞。康熙五十二年四月。[14]

這說明傅聖澤全力協助白晉研究《易經》的時間不過兩年，以後就是主要去做數學和天文學的研究了。當然，傅聖澤自己對《易經》的研究並未停止，他在這一段時間裡仍然寫了不少研究《易經》和中國文化的論文。[15]

白晉作為“索隱派”的主要成員，在“禮儀之爭”中處於相當尷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對閣當所代表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等派別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由於想推進和加深利瑪竇的思想和路線，從而和耶穌會的原有思想和路線也產生了矛盾。白晉將這種矛盾也告訴了康熙皇帝：

臣白晉前進呈御覽《易學總旨》，即《易經之內意》，與天教大有相同，故臣前奉旨初作《易經稿》，內有與天主教相關之語。後臣傅聖澤一至，即與臣同修前稿，又增幾端。臣等會長得[16]知，五月內有旨意，令在京為西洋人同敬謹商議《易稿》所引之經書。因[17]寄字與臣二人云，爾等所備御覽書內，凡有關天教處，未進呈之前，先當請求旨請皇上俞允其先查詳悉。臣二人日久專究《易》等書奧意，與西土古學相考，故將己所見，以作《易稿》，無不合與天教。然不得不遵會長命，俯伏祈請聖旨。[18]

這件事實際上涉及耶穌會內部在“禮儀之爭”中的矛盾[19]，但耶穌會的這種做法無疑會使康熙很反感。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教權對皇權的一種挑戰。有學者認為，耶穌會的這種做法可能是導致康熙逐漸對白晉研究《易經》失去興趣的原因之一。[20]

隨着“禮儀之爭”的深入，梵蒂岡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華傳教士內部的矛盾也日趨尖銳，康熙逐漸失去了對白晉研究《易經》的興趣。

五十五年閏三月初二日。為紀理安、蘇霖、巴多明、杜德美、楊秉義、孔祿食、麥大成、穆敬遠、湯尚賢面奏摺。上將原奏摺親交與紀理安等。諭趙昌、王大化、張常住、李國屏、佟毓秀、伊都立爾公同傳於白晉：紀理安等所奏甚是。白晉他做的《易經》，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個別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全完時，再奏聞。欽此。[21]

雖然康熙對此失去了興趣，但仍讓白晉繼續研究，表現了他的大度和寬容。

我們看到，從康熙五十年（1711）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康熙親自組織了白晉等人的《易經》研究，並隨時解決在研究中的各種問題。這在當時應是件大事。康熙為甚麼要讓白晉等人研讀《易經》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康熙讓白晉研究《易經》之目的及影響

讓一個外國傳教士研究《易經》，現在看起來有些奇怪，但當時康熙那樣做卻並非心血來潮，這個決定自有其內在的原因。

首先，對科學的興趣是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的原因之一。康熙從剛即位時的湯若望和楊光先的曆法之爭開始，就對西方科學有了興趣，這正如他事後所說的：

> 朕幼時，欽天監漢官和西洋人不睦，相互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22)

在中國歷史上像康熙這樣熱愛西方科學用心學習西方科學的皇帝實僅此一人。(23)康熙即位不久就請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2-1688）講授天文數學。張誠，白晉等法國傳教士來華後，他又把張誠，白晉留在身邊講授幾何學。康熙這種對數學的熱情一直保持着。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下令開蒙養齋，讓三太子允祉直接去管。他下旨說：

> 諭和碩誠新王允祉等，修輯律呂演算法諸書，着於養蒙齋立館，並考定壇廟宮廷樂器。舉人趙海等四十五人，係學演算法之人，爾等再加考試，其學習優者，令其修書處行走。(24)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和素給康熙的奏報曰：

> 西洋人吉利安、富生哲、楊秉義、杜德海將對數表翻譯後，起名數表問答，繕於前面，送來一本。據吉里安等曰：我等將此書盡力計算後翻譯完竣，亦不知對錯，聖上指教奪定後，我等再陸續計算、翻譯具奏，大約能編六七本。(25)

這說明了康熙當時正在研究數學問題，他對數學有着極濃厚的興趣。

康熙去熱河避暑山莊，將陳厚耀、梅珏成等人都帶到承德，就是和他們討論《律曆淵源》的編寫(26)，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又修律呂，演算法諸書。”(27)

很清楚，在康熙安排白晉等人研究《易經》之時，也正是他熱衷於西方數學之時。而對《易經》的研究，在中國的經學解釋史上歷來就有“義理派”和“象數派”兩種路向，因為《易經》本身就是符號系統和概念系統的結合體，所以這兩種解釋方法都有其內在根據，而且在《易經》解釋史上這兩種方法都留下了一些名著。在象數派的著作中就包含了許多數學內容，如鄭玄所做的“九宮數”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矩陣圖。(28)

康熙五十年二月(1711)在和直隸巡撫趙宏燮論數時，康熙就說：

> 演算法之理，皆出於《易經》。即西洋演算法，亦善。原係中國演算法，被稱為阿爾朱巴爾。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29)

這段話說明康熙把對數學的興趣和中國典籍《易經》結合起來兩個月後的四月十三日，他就傳旨給江西巡撫郎廷極讓傅聖澤進京協助白晉研究《易經》。

他之所以讓白晉來做此事，是因為白晉入宮後曾和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一起用滿文為康熙講授《幾何學》，做過康熙的數學老師，康熙對他的數學能力是充分信任的。另一點就是，在當時的傳教士之中，白晉的中國文化基礎最好，按康熙的說法就是：“在中國之眾西洋人並無一人通中國文理。惟白晉一人，稍知中國書義，亦尚未通。”(30 在康熙眼中，能完成此事則非白晉莫屬。(31)

白晉對康熙的這個想法應該是清楚的，所以在其《易經》研究中，從象數的角度研究《易經》成為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他在《易數象圖總說》中他說：

> 內易之秘，奧蘊至神，難測而難達。幸有外易數象圖之妙，究其內易之精微，則無不可知矣。(32)

在《易學外篇》首節中又說：

> 易之理數象圖，相關不離，誠哉斯言也。蓋言理莫如數，明數莫如象。象數所不及者，莫如圖以示之。(33)

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文獻中，就有一個白晉研究《易經》的日程表及康熙讀了白晉的研究論文後所下御批，其主要內容就是交流《易經》所包含的數學問題——

> 二十四日。進新改了的〈釋先天未變之原義〉一節，又《釋河洛合一天尊地卑圖為先天未變易數象圖之原》一本，並《曆法問答》、《定歲實法》一本，交李三湖呈奏。奉旨：朕俱細細看過了，明日伺候。欽此。
>
> 二十五日呈覽。上諭：爾等所譯之書甚好了。朕覽的書，合於一處。朕所改已上，所謂地形者之處，可另抄過送上。
>
> 七月初四日呈。御筆改過的《易經》，並新得第四節〈釋天尊地卑圖為諸地形立方諸方象類於洛書方圖之原〉及〈大衍圖〉一張，進講未完。上諭：將四節合定一處，明日伺候。欽此。
>
> 初六日。呈前書並新作的〈釋天尊地卑圖〉〈得先天未變始終之全數法圖〉二張，進講。上諭王道化：白晉作的數，甚是明白，難為他。將新作的〈天尊地卑圖〉，〈得先天未變始終之全數法並圖〉留下。《易經》明日伺候。欽此。
>
> 初七日，進〈大衍圖〉。上諭：將〈大衍圖〉留下朕覽。爾等另畫一張，安於書內。欽此。諭：爾等俱領去收看。欽此。
>
> 十二日。進講〈類洛書耦數方圖之法〉一節，圖一張，呈覽。上諭：將〈耦數方圖之法〉與前日〈奇數之法〉合定一處，爾等用心收看。欽此。本日御前太監葉文忠奉旨取去原有御筆寫〈類書方圖奇數格〉一張，並〈耦數方圖〉一張。傳旨：照此樣多畫幾張。欽此。本日畫的〈奇數方圖格〉二張，教太監李三湖呈上留下。
>
> 王道化謹奏：初九日恭接得上發下大學士李光地奏摺一件並原圖一幅、說冊一節與白晉看。據白晉看，捧讀之下稱：深服大學士李光地精通易理，洞曉曆法。(34)

這裡所講的〈天尊地卑圖〉、〈釋先天未變之原義〉、〈先天未變易數象圖之原〉、〈洛書方圖〉、〈大衍圖〉、〈類洛書耦數方圖之法〉、〈先天未變始終之全數法〉、〈先天未變始終之全數法圖〉，均為從象數角度研究《易經》的圖解。

這實際上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康熙出於對數學的興趣，希望白晉來研究《易經》，發現其中的數學奧秘。反之，白晉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又進一步強化了康熙這方面的興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正是白晉《易經》研究中的數學和象數的內容，"使得康熙領會了其中的數學奧秘，並使康熙對《易經》的興趣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康熙讓一個外國人研究《易經》的原因或在於此。"(35)

其次，通過白晉的《易經》研究來證實"西學中源說"。"西學中源說"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它對清初的思想和學術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是誰最早提出這一思想，學術界尚有爭論(36)，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在其〈三角形推算法論〉中已經明確提出了這個想法：

> 論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曆。曆原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術也。(37)

上面講到康熙五十年(1711)在和直隸巡撫趙宏燮論數時，康熙說："演算法之理，皆出於《易經》。即西洋演算法，亦善。原係中國演算法，被稱為阿爾朱巴爾。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38)這段話是康熙首次把"西學中源說"和《易經》聯繫起來，其依據就是"阿爾朱巴爾"。這個談話的時間是1711年2月。根據這個談話內容及時間，可以作出兩個判斷：一、康熙在此前已經瞭解並學習了西洋演算法阿爾朱巴爾法；二、一開始給康熙講授這一演算法的肯定不是傅聖澤，因為傅聖澤接旨進京協助白晉研究《易經》的時間應是康熙五十年四月以後，即是在康熙和趙宏燮談話之後。魏

若望先生認為，傅聖澤是康熙五十一年八月（1712年8月）在熱河時獻給康熙《阿爾熱巴拉新法》。(39)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張誠、白晉、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0）在給康熙講授西方數學時已經講授了阿爾熱把拉法。在此期間他們從西洋數學所譯的書中就有《借根方演算法節要》，《借根方演算法》。(40)這個名稱有多種譯法，上面講的《東華錄》譯為“阿爾朱巴爾法”，梅文鼎在《赤水遺珍》中稱為“阿爾熱八拉”。這在數學上指的是代數，原作是公元825年的阿拉伯數學家阿爾－花拉子模（Muhammad ibn Musa al-Khwarizmi）所作的名為 *Al-jabr w'al Muqabala* 一書，它是代數學之祖。“這本書在12世紀譯成拉丁文時，書名為*Ludus algebrae et almucgrabalaeque*，後來簡稱algebra，今譯為“代數學”。(41)

代數學源於東方，後傳到西方，康熙說其係“東來之法”(42) 並沒有錯。但正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這個“東”的概念是有很大差異的，實際上應是源於阿拉伯。然而，康熙很可能把它理解為源於中國。此說是不是“傳教士為討好康熙皇帝而故意編造的謊話呢？”(43) 雖說史無憑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在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以前，他就有了“西學中源”的想法，即已有《易經》為西洋演算法之源的想法。也就是說，康熙的這些想法在前，安排白晉研究《易經》在後，說明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時有着很強烈的政治意圖。因為“西學中源說”實際上是康熙對待西學的一種基本策略，是他在中西文化衝突中所採取的一個極重要的文化政策。(44)

當傅聖澤再次向康熙傳授西方的“阿爾熱巴拉新法”時，“用天干開首的甲乙丙丁等字表示已知數，用地支末後的申酉戌亥等字表示未知數（和笛卡爾用a b c d等字母表示已知數，用 x y z 等字母表示未知數相倣），又用八卦的陽爻—作加號，用陰爻 -- 作減號，以＋為等號。”(45) 康熙在學習時很可能想起已經學習過的“借根演算法”，很可能想到以《易經》為代表的符號系統，想起他已形成的“西學中源”思想，因而在安排傅聖澤進京協助白晉研究《易經》之後，又對“阿爾熱巴拉法”感興趣。

梵蒂岡圖書館的文獻也證實了這一點：

> 啟杜巴傅先生(46)知，二月二十五日，三王爺傳旨：去年哨鹿報上發回來的阿爾熱把拉書，在西洋人們處，所有的西洋字的阿爾熱把拉書查明，一併速送三阿哥處勿誤。欽此。帖到可將報上發回來的阿爾熱把拉書並三堂眾位先生們，所有的西洋字的阿爾熱把拉書查明即送到武英殿來，莫誤。二月二十三日。李國屏、和素。(47)

> 字與楊、杜、紀、傅(48)四位先生知：明日是發報的日子，有數表問答，無數表問答書。四位先生一早進來，有商議事，為此特字。六月二十五日。李國屏、和素。(49)

> 字啟：傅先生知爾等所作的阿爾熱巴拉，聞得已經完了，乞立刻送來以便平定明日封報，莫誤。二月初四。李國屏、和素。(50)

康熙前後兩次對阿爾熱巴拉法感興趣，這一方面和他對數學的興趣有關，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西學中源”思想有着直接的聯繫。他在指導白晉研究的過程中，也提醒白晉在中國的古籍中包含着豐富的數學思想，曾告誡白晉：“必將古書細心較閱，不可因其不同道則不看。”這實際是在引導白晉向他的思想方向發展。康熙也就在此期間說：“爾曾以《易》數與眾講論乎？演算法與《易》數脗合。”(51)

康熙讓白晉研究《易經》是他在“禮儀之爭”中採取的重要步驟

“禮儀之爭”是康熙年間中國和西方關係中的最重大事件。這場爭論對康熙的天主教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康熙三十九年（1700），清宮中的耶穌會士精心策劃了一封給康熙的奏書[52]：

> 治理曆法遠臣閔明我、徐日昇、安多、張誠等謹奏為恭請鑒以求訓誨事。竊遠臣看得西洋學者，聞中國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禮，必有其故，願聞其祥等語。臣等管見，以為拜孔子，敬其為人師範，並非祈福佑聰明也而拜也。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依儒禮亦無求佑之說，惟盡孝思之念而已。雖設立祖先之牌位，非謂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過抒於子孫報本追遠如在之意耳。至於郊天之禮奠，非祭蒼蒼有形之天，乃祭天地萬物根原主宰，即孔子所云社郊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有時不稱上帝而稱天者，猶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類，雖名稱不同，其實一也。前蒙皇上所賜匾額親書"敬天"之字，正是此意。遠臣等鄙見，以此答之，但緣關繫中國風俗，不敢私寄，恭請睿鑒訓悔，遠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奏。[53]

康熙當天就批下這通奏摺云：

> 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54]

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宗克萊門十一世公佈諭旨，正式判定"中國禮儀"為異端，予以禁止。[55]

康熙四十四年（1705），多羅特使來華。

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在暢春園接待多羅特使，下諭：

> 西洋人自今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同時，讓在華的傳教士"領票"，告誡傳教士："領過票的，就如中國人一樣。"[56]

康熙四十六年（1707），多羅特使在南京正式公佈教宗禁止中國教徒祭祖敬孔的禁令。康熙在最後一次南巡中接見傳教士，"有永在中國各省傳教，不必再回西洋等語"[57]，並先後派傳教士龍安國（António de Barros, 1664-1708）、薄賢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 1656-1708）、艾若瑟（Giuseppe Antonio Provana）、陸若瑟（José Raimundo de Arxo）返回羅馬，向教廷解釋其政策。

康熙四十九年（1710），馬國賢（Matteo Ripa）、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來華。康熙諭命傅聖澤進京協助白晉研究《易經》。

康熙五十一年（1711），教宗克萊門十一世發出備忘錄，確認多羅在中國所發的教令。[58]

康熙五十四年（1715），教宗克萊門十一世頒佈〈從登極之日〉。[59]

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當着眾傳教士的面，痛斥德理格有意錯譯康熙致教宗的信。[60]

康熙五十六年（1720），嘉樂特使來華。

從我們列出的這個時間表可以看出，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時，正是"禮儀之爭"激烈之時，是在多羅特使和嘉樂特使來華期間，此時也是康熙和羅馬教廷關係緊張之時。這時，康熙開始考慮對在華的傳教士應有一個統一的政策，應有一個要求。康熙四十五年（1706）6月24日，他下諭警告說：

> 近日自西洋所來者甚雜，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為行道者，難以分辨是非。如今爾來之際，若不一定規矩，惟恐後來惹出是非，也覺教化處有關係，祇得將定例先明白曉喻，令後來之人謹守法度，不能少違方好。[61]

這個規矩是甚麼呢？就是要"遵守利瑪竇的規矩"。康熙在幾年中對傳教士反覆講的就是這一點。康熙在第二次接見多羅時，向他說明了對待傳教士的基本政策：

> 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學之道。西洋人來中國者，自利瑪竇以來，常受皇帝保護，彼等也奉公守法。將來若是有人主張反對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難再留在中國。[62]

接着他傳諭全體在京的傳教士說：

> 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爾等傳教，爾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國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們遵利瑪竇規矩，不依教化王的話，叫你們回西洋去，朕不叫你們回去！倘教化王聽了多羅的話，說你們不遵教化王的話得罪天主，必定教你們回去；那時，朕自然有話要說，說你們在中國，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國人一樣，必不肯打發回去！教化王若說你們有罪，必定叫你們回去，朕斷不肯！將他們的活打發回去，將西洋人等頭割回去！朕如此帶信去，爾教化王萬一再說爾等得罪天主，殺了罷，朕就將中國所有西洋人都查出來，盡行將頭帶於西洋去！設是如此，你們教化王也就成了教化王了！(63)

“禮儀之爭”中一些傳教士的表現也令康熙惱火。先是閻當，不通中國文理，卻信口雌黃。康熙責他“愚不識字，擅敢妄論中國之道”，“閻當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論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一點根據。”(64)後來德理格擅自改動康熙給教宗的信，使康熙大怒，認為“德理格之罪，朕亦必聲明，以彰國典。”康熙將他稱為“奸人”，“無知光棍之類小人”。(65)

白晉是康熙最信任的傳教士之一，多羅來華後，康熙讓他直接參與一些重要活動，這都說明了康熙對他的信賴。(66)在這種背景下，康熙讓白晉研究《易經》並在各方面給予支持，這個決定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興趣問題，而是康熙想通過白晉的《易經》研究給傳教士樹立榜樣，讓他們遵守利瑪竇的規矩，使他們知道——

> 欲議論中國道理，必須深通中國文理，讀盡中國詩書，方可辯論。(67)

這是康熙在“禮儀之爭”中同教廷的一意孤行展開鬥爭，爭取入華傳教士按其規定的路線在中國生活傳教的重要政治舉措。

這點康熙在幾次諭批中說得也很清楚。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讀了白晉的手稿後說：“覽博津〔白晉〕引文，甚為繁冗。其中日後如嚴党〔閻當〕、劉英〔劉應〕等人出必致逐件無言以對。從此若不謹慎，則朕亦將無法解脫。西洋人應共商議，不可輕視。”(68)和素就在向傳教士傳達後給康熙的奏報中說：

> ……即召蘇琳、吉利安、閔明鄂、保忠義、魯伯佳、林吉格等至，傳宣諭旨。蘇琳、吉利安、閔明鄂等，共議後報稱：“凡事皇上教誨我西洋人，筆不能盡。以博津文內引言甚為繁冗，故諭日後嚴當、劉英等人出，恐傷我，不可輕視，着爾共議。欽此。洪恩浩蕩，實難仰承。是以我等同心，嗣後博津注釋《易經》時，務令裁其繁蕪，惟寫真事情。奏報皇上。所寫得法，隨寫隨奏：所寫復失真，不便奏皇上閱覽，即令停修。

康熙高興地批覆：“這好！”(69)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讓白晉研究《易經》是和“禮儀之爭”緊緊相連的，康熙決不是把它看作白晉個人的事。白晉研究《易經》已經涉及宮中所有的傳教士。康熙想通過白晉在這場爭論中找到一些應付閻當等人的道理，因為說服的對象是閻當、劉應這樣的傳教士，甚至是羅馬教廷。這個任務當然由傳教士來做要比中國文人來做要好，白晉既得康熙信任，又通中國文理，此事自然由他來完成較為合適。

康熙對白晉的影響

白晉的《易經》研究是在康熙的直接指導下展開的，康熙的思想和要求必然對白晉產生影響。然

而，迄今在這一方面的研究者似乎注意得不夠。我們試從兩個方面來論證這一看法。

首先，通過《易經》研究，白晉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程度有所變化。在《古今敬天鑒天學本義》自序中，白晉寫道：

> 天學者何？乃有皇上帝至尊無對、全能至神至靈、賞罰善惡至公無私？萬有真主所開之道，人心所共由之理也。蓋上主初陶人心，賦以善良，自然明乎斯理。天理在人心，人易盡其性而合於天。嗟乎未幾人心流於私慾，獲罪於天，離於天理而天理昧。至仁上主不忍人之終迷也，……乃以天道之精微，明錄於經，以為世之愚象。(70)

這是白晉在康熙四十六年的思想表述。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其行文是中國化的，但思路和邏輯完全是西方的，是《聖經》伊甸園原善、先祖原罪及天主救贖思路的中國式表述。

在對中國典籍的瞭解上，《天學本義》基本上是對中國典籍的摘錄和民間俗語的收集，尚未在思想上展開。更重要的是全書所分成的幾十道小標題，構成了全書的理論框架。例如：1）天主道理：宇宙之內必有一自有、無形無象造天地萬物之主宰；2）天主道理：天之主宰生人養人治人，安之佑之乃萬民之大君大父母；3）天下萬民皆有一元祖父所生，故天下為一家。(70)從這些標題可以看出，《天學本義》的邏輯結構完全是西方的，全是天主教神學的框架，它和中國傳統思想沒有關係。

這樣，在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的初期，白晉的思想仍停留在原有思想上，其研究結果使康熙很不滿意。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十一日，他在和素、王道化的奏書上批註說：“覽博津書，漸漸雜亂，彼祇是自以為是零星援引群書而已，竟無鴻儒早定之大義。”(72) 這裡康熙所說的“自以為是”是白晉完全按西方那一套來寫，邏輯是西方的，祇是到處引用若干中國古書，但對儒家本義並不理解。康熙把這個想法也告訴在京的其他傳教士。因為事關重大，在京的傳教士們決定把遠在江西的傅聖澤調進京來，協助白晉研究《易經》。六月十日和素向康熙奏報：“遠臣蘇琳、吉利安等跪讀皇上諭旨：至博津所著《易經》內引言，恐日後必為本教人議論。欽此。將書退回。臣等同樣議：皇上洞察細微，深愛臣等，為我等深謀，臣等感激無地。惟臣等均不諳《易經》，故先頒旨。俟江西富生哲再與博津詳定，俟皇上入京城進呈御覽。為此謹奏。請皇上指教。”(73) 這說明傅聖澤的進京不僅僅是白晉的意見，更是在京傳教士的集體決定。不久，和素也向康熙談了他對白晉研究成果的看法，他說：

> 奴才等留存博津所著《易經》數段，原以為其寫得尚可以。奴才等讀之，意不明白，甚為驚訝。皇上頒是旨，始知皇上度量宏大。奴才等雖無學習《易經》，雖遇一二難句，則對卦查注，仍可譯其大概。再看博津所著《易經》及其圖，竟不明白，且視其圖，有做鬼神者，亦有似花者，雖哦不知其奧秘，視之甚可笑。再者，先後來文援引皆中國書，反稱係西洋教。皇上洞鑒其可笑胡編，而奴才等尚不知。是以將博津所著《易經》暫停隔報具奏，俟皇上入京由博津親奏。

康熙同意和素的這個看法，批示：“是。”(74)和素的看法反映了康熙的思想，也說明白晉此時的《易經》研究還未進入角色，尚不能從內在的精神實質上把握《易經》。

梵蒂岡所藏的文獻也說明了這一點——

> 七月初五日。上問：“白晉所譯《易經》如何了？欽此。”王道化回奏：“今現在《解算法統宗》之攢九圖聚六圖。等因具奏。”上諭：“朕這幾個月不曾講《易經》，無有閑着。因查律呂根願，今將黃鍾等陰陽十二律之尺寸積數、整音半音三分損益之理，俱已了然全明。既如簫笛琵琶弦子等類，雖是頑戲之小樂器，即損益之理，查其根原，亦無不本於黃鍾所出。白晉譯《易經》，必將諸書俱看方可以考驗。若以為不同道

則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書不能完。即如邵康節乃深明易理者，其所言占驗乃門人所記，非康節本旨，若不即其數之精微以考查，則無所倚，何以為憑據？爾可對白晉說：“必將古書細心較閱，不可因其不同道則不看。所譯之書，何時能玩？必當玩了才是。欽此”。(75)

康熙在批評白晉對中國本身的書讀得不夠，告誡他要好好讀中國文人的書。

以上這些說明白晉在康熙指定他研究《易經》的初期，仍未找到中西思想的結合點，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十分有限。康熙對白晉的批評產生了影響。白晉此後的《易經》研究有了新的變化，對中國的思想認識有所加深，索隱派的思想也更為成熟和圓潤了。

白晉在《易經．自序》中講到《易經》在中國文化的地位時說：

大哉易乎！其諸經之本，萬學之原乎！《傳》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前儒贊之云：“其道至廣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其誠哉！易理至矣盡矣，無以加矣！”十三經《書經》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三代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實之為大訓。《正義》曰：“夏商周三代之書，有深奧之文，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圖書編》五經序云：“六經皆心學也，說天莫辯乎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孰非心乎？孰非聖人之心學乎？”是知諸經典籍之道，既全具於易，皆實惟言天學心學而已。(76)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白晉對中國古代文獻已較熟悉，對後世的儒家文獻，像孔穎達的《五經正義》等文獻，也比較熟悉了，這和在他寫《天學本義》時已有了明顯的變化。這裡祇是舉個例子，祇要我們將白晉在此期間研究《易經》的文獻和他早期的文字作個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的進步和變化。

【註】

(1) 柯藍尼《白晉生平和著作》(Claudia von Collani,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Steyler Verlag, 1985)；魏若望《中國和歐洲思想的爭論：傅聖澤傳》(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oma,1982))；羅麗達〈白晉研究《易經》史事稽考〉，臺灣，《漢學研究》1997年第15卷第1期；韓琦〈白晉的《易經》研究和康熙時代的“西學中源”說〉，臺灣，《漢學研究》1998年第16卷第1期；吳伯婭《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宗教出版社2002年。

(2) 轉引自林金水〈《易經》傳入西方考略〉，載《文史》第29期，頁367。

(3) 白晉的《天學本義》分別藏在：古朗《法國國家圖書館中文日文書目》(Maurice Couran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areens, japonais,etc* (Paris, 1912) Chinois 7160《天學本義》，7163《古今敬天鑒》(上卷)，7161《古今敬天鑒》(下卷)；余東《梵蒂岡圖書館館藏早期傳教士中文文獻目錄：十六至十八世紀》(Yu Dong, *Cata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I-XVII sec* (Citta Vaticano1996) 25-1《天學本義》，參閱伯希和(Paul Pelliot)目錄號的 Borgia Cinese. 316(14)《古今敬天鑒天學本義》

(4) Borgia Cinese. 316(14)《天學本義》白晉自序

(5) Borgia Cinese. 316(14)《天學本義》韓琮序

(6) Borgia Cinese. 439 (b)

(7) 當時的江西巡撫朗廷極在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五的奏摺中，提到將送江西的傳教士傅聖澤進京。見羅麗達對方豪所講到的有關白晉讀易的十份文獻做了很好的研究，見〈白晉研究《易經》史事稽考〉，臺灣，《漢學研究》1997年第15卷第1期；

(8)(9)(10)(14)(18)(21)(75) Borgia Cinese. 439 (a)，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中)，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1970年，頁280；頁280-281頁；頁281；頁285；頁282-283；頁285；頁280-281。

(11) 參閱John W.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p. 202, Roma, 1982.

(12) Borgia Cinese. 439 (a).

(13) 閻宗臨和方豪先生少抄這個字，見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中)，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1970年，頁285。

(15)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pp. 164-207, Roma, 1982.

(16) 閻宗臨和方豪寫為“通”，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中)，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1970年，頁282-283。

(17) 原稿有“會長”，後刪去。

(19) 白晉在這裡講的會長是誰？羅麗達認為是意大利耶穌會士

駱保祿（Jean-Paul Gozani, 1647-1732），韓琦正確地指出不是駱保祿，但他說是殷弘緒（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2-1741）仍不盡全面，因為此時殷弘緒是來華耶穌會的法國總會長，讓白晉和傅聖澤將所有送給康熙看的研究《易經》的稿要送給會長看的指令是他下的，但具體去落實這一指令的是法國在華耶穌會北京教區的會長龔當信（Cyr Contancin, 1670-1733），也就是說，當時給白晉寫信並具體審查他給康熙的書稿的人是龔當信，而不是殷弘緒。而且，殷弘緒在1711年時也不在北京，而是在江西，他是1722年才到北京。參閱 John W.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pp. 176-179, Roma 1982；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卷）頁550。

（20）參閱羅麗達論文。

（22）《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86。

（23）白晉著、馮做民譯《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臺灣，光啟出版社1966年；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24）《清聖祖實錄》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甲子。

（25）《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87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26）李迪《中國數學史簡編》，頁266，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27）《清史稿》時憲志，卷四五，參閱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

（28）董光璧《易圖的數學結構》頁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9）蔣良琪《東華錄．康熙八九》

（30）《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31）韓琦在〈再論白晉的《易經》研究：從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應〉中提出這個論點：“由此可看出白晉進講《易經》的經過及康熙的意見，從另一側面也可反映出康熙對《易經》所含數學的濃厚興趣。”見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古代中外關係史：新史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論會論文彙編》。

（32）Borgia Cinese.317 (8), p.3.

（33）Borgia Cinese.317 (10), p.1.

（34）梵蒂岡圖書館 Borgia Cinese 317- 4，頁22-24，這份文獻並未注明日期。

（35）韓琦〈白晉的《易經》研究和康熙時代的“西學中源”說〉，臺灣，《漢學研究》1998年第16卷第1期。

（36）徐海松在《清初士人與西學》（東方出版社，2000年）中認為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梅文鼎。王楊宗則認為最早提出的應是康熙，見王楊宗〈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說新考〉，載《科史薪傳……慶祝杜石然先生從事科學史研究四十年學術論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

（37）《康熙御製文集》第三集卷十九“三角形推算論”。

（38）蔣良琪《東華錄．康熙八九》

（39）梵蒂岡圖書館 Borgia Cinese 319- 4，其法文稿題為“代數綱要”（Abregé d' algèbre）。

（40）“九《借根方演算法節要》上下二卷，共一冊，有上述印記（即“孔繼涵印”，“荭谷”及“安樂堂藏書記”諸印）。按孔繼涵藏本，尚有；十一《借根方演算法》原書為三卷本，其中十二《借根方演算法》，八卷一種，又《節要》二卷，不著撰稿人姓氏，藏前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七卷《中算史論叢》頁69，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數理精蘊》編修前曾有《借根演算法節要》一書問世，此書可能是西洋人譯後給康熙講課用的。”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頁326，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41）M．克萊因《古今數學思想》第1冊，頁218-219，轉引自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頁226，中國人民大學1992年。

（42）1712年康熙在教梅文鼎之孫梅玨成“借根演算法”時曾說：“西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之法。”載梅玨成《赤水遺珍》。

（43）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

（44）吳伯婭《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頁431-435；徐海松《清初士人與西學》頁352-365。

（45）梅榮照〈明清數學概論〉，見《明清數學史論文集》頁8-9，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

（46）指的的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0），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和傅聖澤。

（47）（49）（50）Borgia Cinese.439 (a).

（48）指楊秉義，杜德美，紀理安，傅聖澤。

（51）《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一。

（52）這封信是耶穌會士李明在歐洲策劃的還是閻當策劃的，說法不一。見李天剛《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頁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頁217，上海書店2003年。

（53）黃伯祿《正教奉褒》，參見李天剛〈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頁49-50。

（54）黃伯祿《正教奉褒》，參閱羅麗達〈一篇有關康熙朝耶穌會士禮儀之爭的滿文文獻〉，載《歷史擋案》1994年第一期。

（55）（58）（59）（美）蘇爾，諾爾編，沈保義、顧衛民、朱靜譯《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1645-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6）《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四件。

（57）黃伯祿《正教奉褒》。

（60）《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七件。

（61）《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二件。

（62）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124，臺灣，光啟社1961年。

（63）《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四件。

（64）《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十一件。

（65）《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十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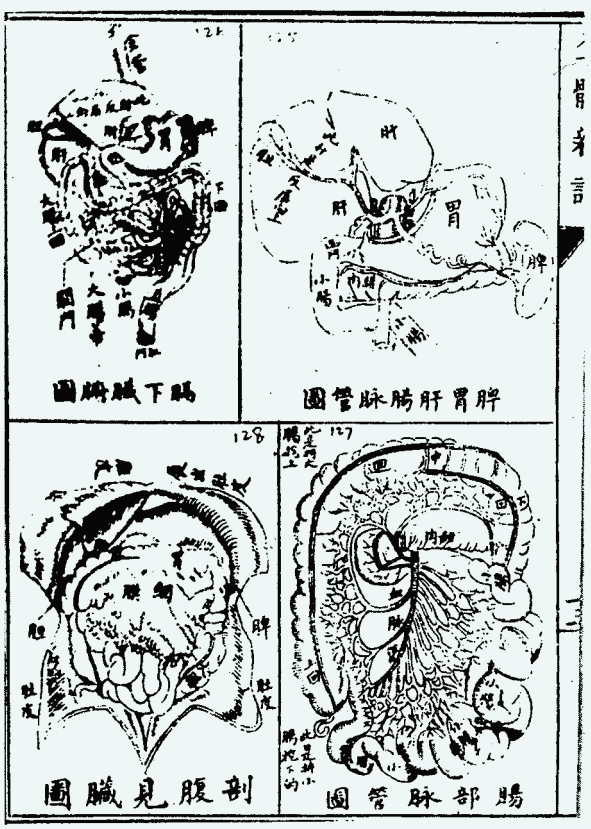
（66）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頁119-132，臺灣，光啟社19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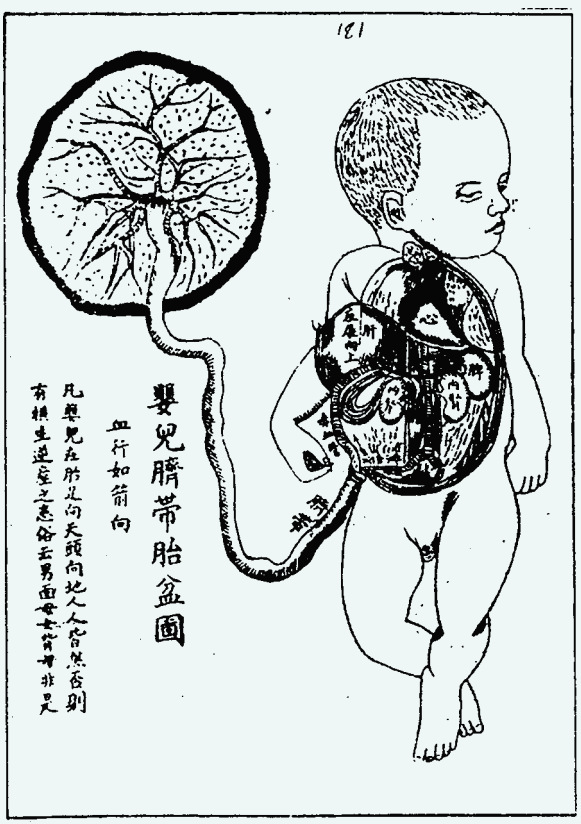
（67）《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十三件

（68）（69）《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725；頁726。

（70）（71）白晉《天學本義》，Borgia Cinese. 316-14.

（72）（73）（74）《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722；頁732；頁735。





合信所著《全體新論》插圖

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醫師，馬禮遜女婿， 1839 年來華，在澳門協助雒魏林行醫， 1843 年掌理香港醫藥傳道醫院，後到廣州設惠愛醫院， 1857 年任上海仁濟醫館醫師，所著《全體新論》集西醫書籍和圖譜二百餘幅。上列四幅轉載自顧衛民等編著的《使徒足跡》第228-229頁，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